

南海仲裁庭在組成和程序上的根本缺陷

法理辨析
李浩然

國際仲裁需爭端國自願參與，所以其公正性十分關鍵，必須兼聽雙方立場，才能達至爭端解決的目的。而作出裁決的程序是否正當、仲裁庭的組成是否中立等，是維護公正的關鍵。

南海仲裁案在這兩個維度上均存在根本性缺陷：仲裁庭的組建過程存在程序缺陷，人員構成嚴重失衡，由此導致的認定無法避免會錯誤百出。事實上，根據2026年7月13日在香港發布的《南海仲裁案裁決新批駁》報告便系統地指出，十年來該裁決在國際司法與仲裁機構的後續判例中被普遍地回避。

一、程序啟動：「強制仲裁」的濫用

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十五部分所構建的「自願程序優先、強制程序補充」雙層爭端解決機制，啟動《公約》附件七強制仲裁程序須滿足一系列嚴格的法律前提，包括爭端各方已履行交換意見的義務、爭端不屬於已被排除的事項等。這些前提條件在《公約》第十五部分第一節及第二節中有系統性規定，任何一項的缺失都足以使仲裁庭的管轄權失去合法基礎。

菲律賓沒有履行事先充分交換意見的必要前提，違背中菲達成的通過協商

和平解決爭議的共識，違反《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有關直接當事國通過友好磋商談判和平解決爭議的規定，違背了「約定必須遵守」、「禁止反言」等國際法基本原則。因此菲律賓在2013年1月22日單方面提起仲裁時，根本不具備啟動仲裁的法律要件。菲律賓單方面將有關爭端提交強制仲裁，是濫用《公約》規定的強制爭端解決程序；卻因政治因素獲得受理。

仲裁程序啟動後，中國自始至終拒絕參與——這不是對國際法的漠視，而是對仲裁庭根本沒有管轄權的正當認定。然而，仲裁庭在僅有菲律賓一方參與的情況下，執意推進全部程序，嚴重違背了國際仲裁的程序正義要求。

二、仲裁庭的組建：由日本右翼一手操辦

南海仲裁案五人臨時仲裁庭的組建過程，本身就充滿了令人質疑的程序缺陷。

按照程序，由於中國不參與仲裁，仲裁員的指定工作由國際海洋法法庭時任庭長完成。而2013年時任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的，正是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這意味着，南海仲裁案5位仲裁員中，除菲律賓指定的1人外，其餘4人均由柳井俊二指定。

柳井俊二的背景本身即引發嚴重關

切。他在日本外交部門工作40餘年，曾任外務省事務次官和駐美大使，被認為是日本右翼鷹派人物的代表。柳井同時也是日本安倍政府安保法制懇談會會長，在協助安倍解禁集體自衛權、挑戰二戰後國際秩序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正值柳井擔任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期間，菲律賓單方面發起了南海仲裁案。由這樣一位與中國存在直接利益關聯、政治色彩鮮明的人士來主導指定仲裁員，其公正性從一開始就沒法得到保證。

三、域外人員壟斷仲裁庭

最終組成的五人仲裁庭包括：托馬斯·A·門薩（加納籍，庭長）、讓—皮埃爾·科特（法國籍）、斯坦尼斯瓦夫·帕夫拉克（波蘭籍）、阿爾弗雷德·H.A.·松斯（荷蘭籍）、呂迪格·沃爾夫魯姆（德國籍）。

這一組成結構的失衡是顯而易見的。五名仲裁員中四名來自西方國家，唯一的非洲籍仲裁員長期居住在歐洲，根本不具備國際法所要求的應有廣泛代表性。整個仲裁庭沒有任何一名仲裁員來自亞洲——而本案恰恰涉及亞洲地區的領土與海洋權益爭議。一個由四名歐洲人主導的法庭，其是否能夠代表世界主要法律體系、特別是亞洲法律體系的公正性，令人嚴重質疑。

國際仲裁庭的組成應當體現世界各

主要法系的代表性，這是程序正義的基本要求。南海仲裁案的仲裁庭組成結構，從任何角度看都難以滿足這一要求。事實上，聯合國、國際法院、國際海洋法法庭都公開聲明，跟仲裁庭毫無關係。仲裁庭絕不是國際法庭，國際海洋法法庭和仲裁庭並不存在任何官方隸屬或關聯關係。

該仲裁庭是在菲律賓單方面發起裁後臨時特設，在案件審結後便會解散的臨時組建一次性機構。而國際海洋法法庭是總部位於德國漢堡的常設官方司法機構，隸屬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框架下的正式國際司法體系。時任國際海洋法法庭前副庭長圖爾克已公開澄清：參與該仲裁的5名人員僅以私人身份參與，完全不代表國際海洋法法庭的官方立場。國際海洋法法庭也自始至終沒有介入案件審理、任何形式的參與、出具官方背書，也從未承認過這份裁決的效力。

四、程序缺陷導致的事實認定錯誤

仲裁庭組成和程序上的根本缺陷，直接反映在事實認定的嚴重錯誤上。仲裁庭對菲方的訴求「往往是先預設結論，然後再搜集中方的證據」。這種審理程序和方式，沒法達到嚴謹的法理分析，更走向了法官的「自由心證」。

這種預設結論的做法，在島礁地位

認定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仲裁庭無視南沙群島在地理、歷史和法律上構成一個整體的基本事實，肆意肢解中國對南沙群島的領土主權。仲裁庭採信多處未經交叉核實、來源單一的證據材料，也違背舉證規則，喪失中立裁判立場。

仲裁庭在管轄權問題上同樣表現出嚴重的不一致：一方面說案件本質不是領土主權和海洋劃界問題，另一方面卻將中菲雙方圍繞領土主權和海洋劃界爭端進行的談判作為菲已履行意見交換義務的依據。一方面堅持認定DOC不具法律約束力，另一方面又將DOC作為菲方已履行交換義務意見的依據。這種邏輯上的前後矛盾，暴露了仲裁庭在程序推進中的隨意和不嚴謹。

五、結語

仲裁庭的組成是程序正義的第一基本要素。當一個仲裁庭由具有明顯政治傾向的人士主導組建、組成結構嚴重失衡、在僅有單方參與的情況下推進程序時，其裁決的公正性已無從談起。程序上的根本缺陷，必然導致事實認定上的系統性錯誤。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的組成與程序運作，均違背了國際仲裁最基本的要求，其所作裁決在法律上也因此沒法具有效力。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法學博士

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鑒中的定位及角色(下)

學者論衡
孔永樂

三、立足多元文明交流，完善香港國際人才培育體系

香港擁有成熟的國際化生活環境與完備基礎設施，具備吸納全球人才、開展跨域文明交流的天然優勢，但現有人才引育機制仍存在細節短板，制約多元文明對話開展。當前香港人才認可名單涵蓋約200所世界頂尖院校，卻過度依附國際學術排名，名單中歐美、日澳院校佔據絕大多數，與國家及香港未來產業、文明交流的多元布局脫節。

東南亞、中東、俄羅斯、金磚國家等新興區域，優秀高校與人才資源豐富，但納入香港人才認可名單的院校寥寥無幾。馬來西亞、越南、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僅極少數院校入圍；俄羅斯作為世界大國、中國核心合作夥伴，僅一所院校上榜；印度擁有大量優秀科技與數學人才，其高校資源亦未得到充分認可，這一失衡格局嚴重制約香港多元文明交流布局。

非西方地區對香港具備極強的吸引力，是香港拓展文明交流的核心增量。對此，香港可在首個五年規劃框架下，細分文明交流領域，從人文哲學、藝術創意、商業經貿、科技發展、民俗文化、宗教交流等維度，搭建多層次、多渠道的跨域合作平台。針對中東、東南亞等重點區域，本地學界與民間機構

可主動邀請當地人文歷史、社會經濟學者來港交流，通過學術研討、文化分享深化雙邊認知，讓海外學者成為中華文明的海外傳播使者。

在地緣政治博弈加劇的當下，香港更需依託經貿合作拓展文明交流網絡，洞悉不同文明背後的商業文化底蘊。亞洲的商業運作往往與傳統儒家文化緊密相關，例如注重家族企業發展、商會宗親會之間的網絡文化，與歐美等商業文化差異顯著。過去十餘年，香港企業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助力沿線國家經濟融合與文化包容，但仍需進一步拓展文明交流項目，健全對外開放與文明互鑒機制，以民心相通夯實合作根基。

中俄文化交流是香港拓展多元文明合作的典範。前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曾發文表示，中俄戰略合作關係深厚，香港作為國家對外開放門戶與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應深化與俄羅斯在文藝演出、展覽交流、圖書館建設、藝術教育、創意產業等領域的合作。本年度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的俄羅斯皇家珍品展，展示俄羅斯宮廷器物與文化瑰寶，為香港民眾接觸俄羅斯文明提供珍貴渠道。

依託「一國兩制」優勢與中西融匯的文化底蘊，香港具備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先天條件，但一切發展離不開人才支撐。筆者認為，香港現時了解及推動中西文明交流項目

的人才培育生態體系仍未成熟。在「十五五」規劃中「支持港澳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整體框架下，可以明確方向完善香港的國際人才培育機制。

香港近年來已積極透過多方面的政策及措施吸引國際人才，但在語言、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及培訓相對薄弱。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強調要體現繼承性、民族性、原創性、時代性、系統性、專業性。近年來，國家更加重視哲學及社會科學的發展。區域國別研究已經列為交叉學科的國家一級學科。這是一門對世界不同國家和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人文、地理、資源等進行全面研究的交叉學科。

從地理位置的角度看，香港一直是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重要門戶，但至今香港各主要大學相關的東南亞研究中心未有把握此優勢，校園內相對欠缺來自東南亞等地的學者專家，在人文、經濟及科學領域與香港本地學者進行廣泛交流。中東、中南歐、東歐、俄羅斯及非洲地區的研究學者亦相對缺乏。希望未來商界及本地高等院校有更多合作的地方，加強區域國別學建設，緊密因應國際形勢的需求，培養更多涉外領域人才。

四、對接全球文明倡議，彰顯香港獨特時代價值

最後，香港是中西文明交流融合之地，推動全球文明倡議大有可為。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球文明倡議，秉持文明平等、對話互鑒、包容共存的理念，反對文明衝突論與文明優越論，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全球文明發展貢獻中國方案，也為香港對外交流發展提供根本遵循。

香港向來是民間外交與國際人文交流的活躍載體，眾多社會組織長期開展國際公益與交流活動，踐行全人類共同價值。例如共享基金會（GX Foundation）深耕老撾、柬埔寨、塞內加爾、洪都拉斯等多國，開展醫療援助等人道主義項目，不僅助力當地民生發展，更實現民心相通，搭建文明紐帶。同時，基金會組織香港青年走進內地外交學院培訓，深化青年對國家外交體系與全球治理的認知，培育青年文明交流使命感。

在踐行全球文明倡議的過程中，香港不僅要持續推動人文交流，更要依託獨特制度優勢，為全球治理與現代文明發展提供香港範例。全球化帶來經濟繁榮的同時，也衍生出貧富分化、環境惡化等全球性問題。香港近距離見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的發展演變，其「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為全球探索多元現代化路徑、實現不同文明

與制度共存發展提供了可借鑒的範本。

文明是人類集體智慧的結晶，多樣性是人類文明的本質屬性。全球文明倡議的核心，是以交流隔除文明隔閡、以互鑒化解文明衝突、以包容摒棄文明霸權，倡導各國秉持開放胸懷尊重不同文明內核，不強推自身發展模式與價值觀。

未來五年，香港需緊扣國家「十五五」規劃部署，對接全球文明倡議，持續擴大中外民間友好交往，築牢中西文明交流窗口地位。香港對外交流友好協會等機構成立以來，積極舉辦國際論壇、研討會，邀請國際政要與學者來港交流，探討多邊主義與全球秩序建設，探索參與國際事務的全新路徑。相關機構提出的聯合站機構落戶香港的建議，以及亞投行在港設立辦事處的布局，將進一步強化香港的國際平台屬性。

當前國家身處百年變局關鍵階段，全球文明格局、經濟格局、治理格局全面重構。香港憑藉獨特的區位、制度、文化與人才優勢，擁有國際化高標準的規則體系與專業資源，既能深度解讀中西文明差異與內核，也能為全球經濟發展、社會治理、文明進步提供創新方案。未來香港將持續對接國家戰略，深耕多元文明交流互鑒，成為全球踐行全球文明倡議、推動人類文明共同進步的核心樞紐城市。

香港中文大學政務與政策科學學院博士、講師

英揆須頂住美國壓力 深化對華合作關係

國際觀察
江樂士

伯納姆周一正式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國首相之前，美國便已對其組閣計劃指手畫腳。據《獨立報》7月4日引述知情人士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團隊私下向英國對口官員及工黨高層放話，直指伯納姆若任命能源安全大臣米利班德為新任財政大臣，將「鑄成大錯」。究其原因，米利班德極力反對北海石油鑽探，斥此舉為「破壞氣候的行徑」，這激怒了信奉「盡情鑽探」（drill, baby, drill）的美國政府，美方因而企圖排擠米利班德。

在過去，華盛頓若敢妄圖干預英國的内閣任命，簡直是天方夜譚。但如今美方公然插手，恰恰暴露了2020年脫歐後，美國對待英國的真實態度：英國已不再是美國在歐盟的「代言人」，如今不過是對美唯命是從的附庸，美國對英國已毫無尊重可言。斯塔默曾試圖在這一窘境中挽回些許尊嚴，卻徒勞無功。特朗普對斯塔默的不屑溢於言表，直斥

其為「失敗者」。特朗普今年四月接受天空新聞台採訪時就直言，英美所謂的「特殊關係」已然「慘不忍睹」。斯塔默還在強撐顏面，聲稱英美特殊關係「絕非單一事件所能撼動」，但斯塔默不過是在自欺欺人，所謂的「特殊關係」完全由美國單方面主導。英國若不肯順從，這層關係便一文不值。

特朗普毫不掩飾干預行徑

舉例而言，斯塔默拒絕加入美國對伊朗非法戰爭一事，便令特朗普大發雷霆，怒斥英國和其他北約盟國是「懦夫」。他更放話，自己「破例」給了英國一份優厚的貿易協定，且「隨時可以撤回」。言下之意，既受其惠，必承其命；若敢忤逆，必遭災殃。

盟友間的分歧在所難免，但雙方總會盡力關起門來解決，絕不輕易攤在全球媒體面前。至於公開辱罵盟國領袖，在過去更是外交大忌。回顧越戰期間，美軍深陷泥沼，澳洲、新西蘭和韓國都出兵相挺，最親密的盟友英國卻拒絕派

兵參戰，時任美國總統詹森心中固然懊惱，但並未因此對英國惡言相向。當時任英國首相威爾遜提議以其他方式從旁協助時，詹森僅是輕描淡寫地回覆：若是威爾遜手頭上有富餘人手相助，美國很樂意接納。

時至今日，特朗普政府干預英國乃至歐盟內政的行徑，幾乎已到了毫不掩飾的地步。英國皇家聯合軍種國防研究所在今年2月26日警告，美國當前作為已構成來自傳統盟友的嚴重干預，規模與破壞力甚至遠超俄羅斯。該智庫更一針見血地指出，華府的意識形態目標，早已與美國科技巨頭商業利益深度綑綁，這些企業正聯手將英國與歐洲的網絡監管，惡意抹黑為言論審查。這也是美國企圖絞殺英國《網絡安全法》的根本原因。《網絡安全法》的本意是保護兒童免受網絡不良資訊毒害，強制要求包含美國企業在內的網絡平台與色情網站，落實年齡驗證、主動審查內容。然而，美國副總統萬斯為護航自家科技巨頭免受約束，竟將此法案痛批為「極

端審查」與「對言論自由的攻擊」。萬斯想必是認為只要將該法案徹底妖魔化，英國政府除了乖乖低頭，重新審視、甚至廢除法案之外，將別無選擇。

對美卑躬屈膝換不來尊嚴

不僅如此，美國如今更步步進逼，妄圖主導英國的外交政策。以印度洋查戈斯群島（Chagos Islands）為例，國際法院早於2019年便裁定英國的持續佔領屬於非法，應「盡快」將領土歸還給毛里求斯。2024年，英國與毛里求斯終於達成協議，英國同意移交主權，藉此換取99年的租約，以維持美英共用的迪戈加西亞島（Diego Garcia）軍事基地運作。然而令斯塔默始料未及的是，特朗普竟對此雷霆大怒。今年1月，特朗普痛斥該協議「愚蠢至極」，硬生生逼迫斯塔默無視國際法，將批准程序無限期擱置。儘管伯納姆今年7月頂住壓力，宣布計劃重啟查戈斯協議，但倘若特朗普故伎重施，像對待斯塔默那般極限施

壓，伯納姆能否頂住美國壓力，無疑會備受關注。

當初英國民眾公投脫歐、期盼重獲主權時，絕非為了剛擺脫布魯塞爾的掣肘，轉頭又對華府卑躬屈膝。為了英國的未來，希望伯納姆能展現出更堅強的意志，挺起脊梁，向特朗普、乃至全世界證明：英國將堅持獨立自主，捍衛自身利益。儘管挑戰重重，但英國在亞太地區，依然不乏實力雄厚的夥伴。縱然他國的善意不能視為理所當然，但仍期盼在伯納姆站穩腳跟之際，亞太地區的夥伴能適時伸出援手。而在亞太布局中，對華關係尤為關鍵。斯塔默在任期中，曾尋求與北京建立更緊密的關係，理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伯納姆在擔任大曼徹斯特市長期間，也與中國保持着務實友好的往來，為了英國的未來，希望他能深刻體認到，深化與中國的合作才是正道。

註：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小題為編者所加

律政司前刑事檢控專員